

《心理学报》审稿意见与作者回应

题目：传承动机对金融冒险行为的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

作者：王琳 陈增祥 何云

第一轮

审稿人 1 意见：

论文总体水平较高，有发表的价值。评阅人之所以选择大修后再审，意图与作者就以下几点对话讨论，意见建议仅供参考。

意见 1：探讨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等概念的国内外文献较少，且多出现在近期，属前沿话题。

回应：感谢您的认可！在文章修订期间，我们又重新对最新的相关文献进行了补充与更新，并增加了两个实验（一个是作为新的实验 2a,一个是替换原来的实验 3）。本文力图向读者介绍传承动机概念，并探讨其效应，期望本文在修改后能够更好的说明文章的理论贡献。

意见 2：这些概念，包括童年社会经济地位，反映了自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到哪里去”人生三大哲学问题联系紧密，意义重大。评阅人建议论文总体立意，不要局限于实验中的经济决策行为，不要局限于论文科学层面的贡献，做些升华。毕竟心理学与哲学母体的关联相较其他学科更为紧密。

回应：感谢您提出的这点建设性意见！全体作者完全同意您的观点：传承、自我连续性等概念与一些人生基本哲学问题息息相关。为响应您的建议，我们努力在概念介绍与讨论部分做了理论升华的尝试，比如在“6.2 理论贡献”的第三段部分，我们重点从存在主义哲学的视角论述了传承的重要性，并深入探讨传承概念与死亡概念的联系与区别（并以重新调查的样本量为 202 人的实证结果论证两个概念的区别）。当然，限于篇幅与作者的哲学功底，可能我们的论述还不能完全到位，还请您继续批评指正！

意见 3：研究整体思路采用动机->认知->行为的模式，没有问题，但评阅人认为认知->动机->行为的模式，在人类行为中更为普遍，譬如认知决定论。若按这一模式重新设计实验，结果及其意义会否有所不同？

回应：感谢您提供的新思路！本文探讨的关键核心概念是传承动机，它在文献里更多是被视之为一种个体动机，在此前提下学者们探讨该动机如何影响人们的各种行为。由于概念本身的性质，以及遵从前人的研究范式，本文暂时还是将之视为动机，并遵从动机——认知——行为的模式。

但您的意见也确实让我们深思在未来的传承概念研究中，是否可能将之作为“认知”概念来处理，比如在个体的认知层次上凸显传承概念，让个体意识到人们的精神、价值观等是可以实现传承的，在此前提下从认知——动机——行为的视角来重新设计实验。但我们也不得不遗憾的承认，这个新思路下的实验设计可能与现有的研究思路无法很好的融合，所以该新的研究思路只能有待未来再考虑。但我们在此感谢您提供的启发性思考！

意见 4：应清楚表明本文的研究动机。开篇部分，引出传承动机为自变量发起研究，这很好，但为何后续是自我连续性、经济决策行为？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针对该意见，我们重新撰写了引言的开头部分（见新稿件开头的第二段和第三段），重点提出我们为何要从风险情境来研究传承动机。撰写逻辑如下：在文章第一段提出何为传承动机以及它的普遍性与重要性后，第二段是高度概括总结现有传承动机研究，从而指明该领域的研究还十分匮乏；进而提出本文要从金融风险情境研究传承动机与风险的关系，但为何是金融风险情境呢？原因如下：

“本文将从风险情境的视角考察传承动机与个体金融冒险行为间的关系。我们之所以从金融风险角度探究传承动机的效应，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各项决策几乎都会涉及到风险的概念(Mishra, 2014)，因此探究二者的关系将大大增进我们对传承动机的认识与了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在当代社会中，涉及金钱收益与损失的金融风险决策是个体风险决策的重要构成内容，金融风险决策行为小至影响个体幸福、大到影响家庭和谐与社会长治久安(Greenberg & Hershfield, 2019)，因此研究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我们期待如上论述可以更好的向各位评审人和读者说明我们为何要选择金融冒险行为作为研究情境。此外，我们是在文章具体研究问题的部分（文章第三段）直接提出自我连续性的概念，当然，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提出这个概念，在后续部分会仔细陈述其中的逻辑。

意见 5：应强化本文的理论基础。假设 3 提出基于生命史理论，很好，但生命史理论是否能支撑假设 1、2 的提出？如可以，行文未体现，如不可以，则需要另找理论。总之，结合第 2、4、5 点，作者在文中应该回答这个问题：基于什么理论和研究动机，将传承动机、自我

连续性、经济决策行为联系起来研究，并提出假设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回望论文的第一稿，我们确实发现文章整体的理论深度与整体逻辑严谨性还不够。在综合另外两位评审人的意见上，我们在此轮修改稿的正文中新增加了一个实验（目前的实验 2a），替换了一个实验（从探究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改为考察当下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所以用新实验 3 替换原来实验 3）。

在此，我们重新对我们的理论推导做个梳理，期待能够向您完整的表述我们的逻辑。

首先，整个论文都是围绕自我这个概念展开论述。特别是新的文稿中我们基于风险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 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提出了人们为何会规避风险或者偏好风险的机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源于当下自我状态与未来自我的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具体论述可见“1.3 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金融冒险行为”部分）。由此，不管是传承动机的概念、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概念，还是风险的概念，三者全部统一于“自我”这一主题。这使得整个论文有了一个清晰的主架构，也部分回答您提及的用何理论将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经济决策行为联系起来的问题。

其次，在具体关于传承动机为何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上，请参看假设 1 和假设 2 的论证过程，在此不再赘述。但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您可以从新文稿里面看出来这两个假设的提出实际上都是围绕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这两个核心概念展开论述的。所以整体上新文稿的假设推演过程具备更高的逻辑严谨性。

第三，在原先文稿中，我们为论证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我们提出了生命史理论。鉴于您的意见，以及第三位评审人同样提出“童年代表的是消费者的过去，所以引入童年又把过去的情况引入研究，增加了论证的复杂度。一个人的过去要通过影响现在才能影响未来，而不是在文中直接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所以，我们在新的文稿中将儿时的社会经济地位替换为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重新设计实验并收集数据，论证了个体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会调节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具体论证逻辑如下：

“传承动机在时间维度上通过将未来自我纳入当下考虑范畴，从而提升未来自我连续性。此效应的发生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人们对当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从而才可能愿意将当下自我延伸到未来。试想，如果自我对当下自己的状态是消极否定的，那么个体更有可能期望自己能够改变当下状态，而非将负面的当下自我延伸至未来。比如 Yang 和 Urminsky(2015)就发现悲观/乐观状态下的个体会因为当下自己的消极/积极状态而倾向于降低/提升与未来自我的联结。与本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就是影响个体对当下自我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变量。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由于掌握更多的资源，具备更高的掌控感，因此对当

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会倾向于在未来继续维持当下的高社会地位(Joshi & Fast, 2013)。于是提升此类群体的传承动机，他们会愿意继续将当下积极自我延伸到未来，进而获得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往往缺乏资源与控制感，并且时长遭遇自我威胁，此类群体寻求的是在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他们并不期望将当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Joshi & Fast, 2013)。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启动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传承动机，他们也无意愿将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建立联结。结合前文的假设 1 和 2，本文有如下假设：

假设 3：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强化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进而影响金融冒险行为。”

第四，您原先提出了生命史理论能否支撑假设 1 和 2，虽然现在我们采用个体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来调节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的关系，但您的这个问题依然是有效的，即这个调节变量如何与现有的假设 1 和 2 建立联系。为此，我们专门在讨论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力图说明当下社会经济地位改变了个体是否有意图去改变当下自我的状态，一个只有对当下自我感到满意的个体才可能因为传承动机而愿意将当下自我延伸至未来，从而提升自我连续性。所以，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和当下社会经济地位都是围绕着自我的动态性而产生关联，并最终构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补充说明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当下社会经济地位三者关系的内容下：

“最后，本文还发现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会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正常情况下，人们一般会对自己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甚至变为过度自信(Johnson & Fowler, 2011)，所以对当下自我拥有积极评价的人们才可能在传承动机的作用下把积极自我延伸至未来。但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言，他们的目标在于改变当下状态，并不愿意将当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所以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提升作用在此类群体身上体现的并不明显。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预示着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更多的会调节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因素。”（还可见于文中 6.2 理论贡献部分的第五段）

总结：在您和其他两位评审人的建议下，本文全体作者在文章的理论深度与假设推演上进行了更加深入的研究与思考，期望我们在新文稿中所丰富的理论阐述与新的实证证据（两个新实验，外加一个样本量为 202 人的问卷调查）能够较好的回应您的建议。

意见 6：“立德、立功、立言”，如果姑且将经济决策行为看作“立功”，那么传承动机、自我连续性是如何影响“立德”、“立言”的？

回应：感谢您的洞见！确实如您所言，传承动机会影响人们的“立德”与“立言”。在我们

已经完成的另外一个独立项目中，我们就发现启动个体的传承动机会提升人们从事亲社会行为的可能性。而传承动机对“立言”的影响正是我们目前正在开展的另外一个项目。所以我们完全认同您提出的传承动机会影响个体的“立德”与“立言”的意见。

就本文而言，它的聚焦点是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风险偏好的影响研究，所以在本文还较难同时将“立德与立言”的内容纳入进来。

意见 7：动机与行为不一一对应。传承可以有“流芳百世”，也可以有“遗臭万年”，这说明其中必有调节机制影响动机的行为表达（作者在研究不足与展望中也提及了）。具体到本研究，得出童年期社会经济地位降低个体金融冒险行为，这很好。但主动选择冒险、不选择冒险与主动采取行动，规避风险是否应考虑区分并体现在实验设计上？

回应：感谢您的洞见！首先，我们完全同意您说的关于个体实现传承目的的行为表达有多种方式，从形式上看可能有“立德、立功和立言”，从行为效价上可能有“流芳百世”和“遗臭万年”。而且我们还在讨论部分对该调节机制进行了更深入的阐述，具体如下：

“第三，为人铭记既可以通过对社会实施正向影响从而实现传承，极端情况下还可以通过所谓的“遗臭万年”方式被人记住。所以后续对传承动机的研究还可以考虑从反向来启动传承动机，即不想被后人记住自己的什么内容(Zaval et al., 2015)。但该操纵方式的难点在于正常情况下人们对自己总是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甚至产生过度自信(Johnson & Fowler, 2011)，所以撰写自己的消极点可能会给参与者带来焦虑、不适等冲突体验，从而干扰实验结果。此外，个体要实现自我的传承必须是自我被自己所属文化的价值观所认可，所以通过“不想被后人记住自己的什么内容”来启动传承动机也可能存在有效性问题。”

此外，您提及的“主动选择冒险、不选择冒险与主动采取行动，规避风险是否应考虑区分并体现在实验设计上”这个问题，就我们所知，似乎在现有研究中没有涉及到这个区别。所以在查阅大量文献后，我们新补充的两个实验也就没有区分这种区别。

意见 8：基于 6、7 点，本文若能补充完整，则贡献更大。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对本点的回应可见上面的回复内容。我们珍惜每一次都是来之不易的修改机会，所以我们会尽最大可能来完善文章质量。

意见 9：研究设计严密，合乎规范。三个实验层层递进，注意细节的处理。这方面没有什么大毛病可挑的。仅建议将操控检验单独设个小标题来写。

回应：感谢您的建议，我们已经将操作检验部分作为单独的部分撰写，具体可见文中相应的

地方。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洞见与细心！您的系列意见让我们对整个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了更多的思考，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您再批评指正，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完善与修订！

.....

审稿人 2 意见：

本研究探究了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决策中冒险倾向的影响。过往研究更多地关注传承动机对人际行为(如亲社会行为、跨代际决策)的作用，而本文提出，传承动机通过增加自我连续性感知进而减少人们的金融冒险行为，丰富了传承动机影响个体决策的研究。但是，本研究在对风险的定义、理论推导、数据分析方面也存在一些问题。

意见 1：文章的第一部分(1.1 之前)只分别介绍了本研究涉及的几个变量的重要性，但没有清晰地阐述为何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以及这一研究问题有何重要意义。作者仅通过“本文的创新在于将首次在金融决策领域探讨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决策中冒险倾向 (Financial risk-taking)的影响”这句话陈述了研究问题，那么从现实与理论的角度，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仅仅陈述“它将传承动机研究拓展至个体金融决策领域”是远远不够的。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为更好的回应您的建议，我们重新撰写了文章的第二段和 第三段内容，重新写作的逻辑首先是高度概括现有的传承动机效应研究的内容，突出了本文在理论上拓展其研究领域的贡献。其次，如您建议，我们从理论与现实两个方面提出为何要将金融冒险行为作为研究情境，具体论述如下：

“我们之所以从金融风险角度探究传承动机的效应，一方面是因为人类的各项决策几乎都会涉及到风险 的概念(Mishra, 2014)，因此探究二者的关系将大大增进我们对传承动机的认识与了解;另外一方面是因为 在当代社会中，涉及金钱收益与损失的金融风险决策构成了个体风险决策的重要内容，金融风险决策行为 小至影响个体幸福、大到影响家庭和谐与会长治久安(Greenberg & Hershfield, 2019)，因此研究其影响因素就显得尤为重要。”

第三，在文章开头第三段，我们更加明确提出本文的研究问题是什么，以及高度概括本文可能存在的贡献点(更为详细的关于理论贡献的论述可见最后讨论部分)，具体内容如下：

“鉴于以上论述，本文将从动机视角出发，尝试回答以下问题:(1) 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个体的金融冒 险行为?(2) 上述效应发生的心理机制是什么?(3) 此效应又受到什么因素的

调节?文章通过四个实验对 上述问题进行了回应,发现传承动机会通过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的连续性感知,进而弱化人们的冒险行为, 并且个体社会经济地位对上述过程起到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的传承动机和金融风险决策的文 献,还为个体与企业如何运用传承心理弱化冒险行为提供实践启示。”

总而言之,我们对问题提出部分的第二段和第三段进行了重新的写作,尽可能的将本文的写作逻辑进行了清晰的阐述,希望这样的修改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意见 2:风险的定义及理论推导,本文缺少对风险的定义。从 1.3 部分的内容来看,作者把风险等同于危险,且在行文里表达出“冒险是有危害的行为”。但是,学术界比较认同的方法是根据结果的变化范围(outcome variance)来定义风险。如果两个选项的期望值相等,一个选项的结果变化范围较大,另一个选项的结果变化范围较小,那么,前一个选项的风险更大,而后一个选项的风险更小(Mishra, 2014)。从实验材料来看,作者的确是通过结果的变化范围来代表风险大小的。但是,理论推导部分没有讲清楚为什么传承动机促使人们选择变化范围较小的选项。是因为传承动机唤醒了人们对不确定的厌恶吗?还是因为其它原因?同时,理论推导部分也没有讲清楚自我连续性促使人们选择变化范围较小的选项。作者认为,具有传承动机的人会意识到自己当下的决策将影响未来他人的福利,按照这一逻辑,选择结果变化范围更大的选项能给未来他人带去更多可能的获益,即更多可能的福利。为什么从理论上,传承动机不会增加冒险倾向?另外,冒险象征着能力,因为只有拥有生理、经济或社会资源的人才能承受冒险带来的代价(Mishra, Barclay, & Sparks, 2017)。当人们的传承动机被激活时,他们更有可能希望塑造更好的自我形象(例如有能力),因而有可能倾向于冒险。当然,上述两种可能也许成立,也许不成立。作者需要在确定对风险的定义之后,围绕该定义下冒险行为的特征,从理论上论述传承动机为何以及如何影响冒险行为。

Mishra, S. (2014).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biology,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8, 280–307.

Mishra, S., Barclay, P., & Sparks, A. (2017). The relative state model: Integrating need-based and ability-based pathways to risk-t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1, 176–198.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您的意见让我们对风险理论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而且在新文稿中我们也重新根据您提供的文献进行了理论阐述与假设推理。针对您上面的系列意见,我们做如下回复,希望能够满足您的要求。

首先,我们在您提供的论文索引下阅读了大量关于风险的相关研究,重点是您提供的 Mishra 及其合作者的论文。由此我们发现此前对风险的认识是不到位的:风险跟危险,不

确定等概念不完全一样(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风险的概念是中性的，所以不等同于危险；风险虽然经常跟不确定性一起出现，且不确定性会导致风险。但在确定性情况，可以依然存在风险。本文对风险的操纵实际上就是在控制住确定性影响后通过结果变化范围大小来实现风险的差异。所以，首先感谢您指出的不足之处，我们已经在文中相应部分进行了全部的修订。

其次，您提供的 Mishra 及其合作者的文献让我们重新定义了风险的概念，并选择风险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作为本文的理论基础，从此我们构建了完整的从传承动机到自我连续性到风险的研究框架。具体的关于传承动机如何通过未来自我连续性影响风险偏好的推导过程可参看新文稿的 1.3 部分。在此，我们陈述基本的推导逻辑，首先是我们借助风险理论中的风险敏感性理论，提出个体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个体的当下状态与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如此，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就转化为一个与自我息息相关的概念。根据风险敏感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风险决策是一个与自我的当下状态和未来目标息息相关的一个决策。由于未来目标总是与未来的那个“我”相生相伴，所以结合自我的时间维度，风险决策就转变为取决于当下我的状态与未来我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程度。然后我们从三个方面提出为何传承动机导致的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会降低消费者偏好风险的可能性，具体罗列如下：

“具体而言，(1)自我连续性意味着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确保未来自我与当下自我的各自状态与需求不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结合风险敏感性理论，具有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更偏好低风险选项。(2)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在为未来的那个我做选择时会跟当下这个我的选择保持一致，规避变化(比如选择同样口味的食物; Yang & Urminsky, 2015)。因此根据风险本身的定义(结果的变化范围)，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选择低风险选项。(3)从现有一些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间接推断未来自我连续性会降低个体的风险偏好，比如有研究表明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更愿意进行储蓄养老(Joshi & Fast, 2013)，更节俭(Bartels & Urminsky, 2015)等，这些行为都暗含着为了降低未来自我的财务风险而实施的一种风险规避行为。”

我们期望通过上面的论述能够较好的阐明传承动机弱化风险偏好是源于它提升了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而高未来自我连续性会弱化个体偏好风险。

第三，您提出是否存在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个体偏好风险的可能性。我们仔细思考后认为可能也存在这种可能性。比如可能具有某种人格特质的个体（比如具有雄心壮志者）会因为传承动机的激活，而考虑自己如何在更广的范围内去影响他人，造福他人，于是转而关注

风险选择中的收益，于是具有更高的冒险倾向。这种可能性我们在未来研究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见新文章的最后一段），具体如下：

“第五，本文发现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但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是否存在某种特殊情况使得该关系得以逆转，比如在具有某种人格特质，持有某种信念的个体身上，或者在某些情境下传承动机的激活反而会提升人们的风险偏好。”

与此同时，在您的启发下，我们重新分析所有实验中传承动机启动组的参与者所撰写的开放式问题（你希望后人会记住你的什么呢？）的答案。我们会发现正常情况下人们在回答希望自己的什么东西被后人铭记时，人们并没有普遍表现出某种“雄心壮志”，比如名留青史，比如希望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反而，人们普遍表现希望后人能够记住自己诸如善良、诚实、友好或者踏实等“普通”的品质。可能普罗大众实现传承的方式与我们所理解的名留青史，留下巨大印记的方式有所区别。所以，很可能在正常情况传承动机是弱化个体的风险倾向。

总结，关于是否存在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人们风险偏好的可能性，我们首先承认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所以把它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补充进文章的讨论部分。另外，假如存在这种逆转的可能性，那么中介机制也很可能不是未来自我连续性，届时需要去考虑新的中介机制。但考虑到本文当前的故事是首先想在文献中确认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以及可能的机制。只有当主效应确认后，未来的研究才可以有进一步考虑的空间。所以我们在新增补的实验里面就并没有去进一步考虑这种可能性，因为它将完全改写本文的所有逻辑架构与写作。期望我们上述的解释与做法能够令您理解与谅解。

第四，您提及是否可能存在“当人们的传承动机被激活时，他们更有可能希望塑造更好的自己形象（例如有能力），因而有可能倾向于冒险。”感谢您提供的这一点建设性意见，为更好的回应传承动机是否可能影响人们的印象管理需要，我们在新增加的实验 2a 中测量了个体的印象管理需要，它由两个测项构成，分别是“我很在意我是否给别人留下了好的印象”和“我会尽力维持自己在他人眼中的形象”(White & Peloza, 2009; 1 = 非常不同意, 7 = 非常同意, $r = 0.65$)。在这里，我们只是笼统的测量印象管理需要，并没有特指对能力方面的印象管理。因为在分析了参与者所撰写的传承内容后，我们并没有发现人们会特别强调自己的能力，希望自己的能力能够凸显，进而实现传承的可能性；反而是人们更多强调自己的良善，希望自己的良善（Morality）能够被传承。结果显示传承动机并不影响个体印象管理动机的程度($M_{\text{legacy}} = 5.48, SD = 1.06, M_{\text{control}} = 5.47, SD = 1.21; F(1, 259) < 1, p = 0.93$)。更为重要的是，在控制住上述变量的影响后，传承动机依然可以显著地影响个体对低风险工作的偏好($F(1, 255) = 5.38, p = 0.021, \eta^2 = 0.021$)。

意见 3：竞争假设：研究者提出启动传承动机主要有两个作用：其一，拉近当下与未来的时间距离；其二，促使人们考虑他人的利益。本文提出的自我连续性属于后者，那么是否可能存在一个替代性假设：启动传承动机后，被试觉得未来更近了，所以更倾向于保守？另外，研究者在讨论中提到了传承动机与死亡概念存在一定联系。那么是否有可能是传承动机激发了死亡概念？由于人们害怕死亡，不愿冒险。

回应：感谢您提供的上述意见，让我们对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在第一稿的传承动机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推导过程中，我们论述了传承动机的两个特性（时间维度的关注未来，与人际维度的关注他人），并从这两个特性出发探讨它如何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降低个体风险偏好。评审意见回来后我们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评审人或直接或间接的表示出该推导过程的复杂性，且依据传承动机两个特性的推导逻辑也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难度。综合评审人意见，以及全体作者的再三讨论，在目前这一稿的撰写中，我们在论述传承动机概念本身时，就不再特别强调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见新文稿的 1.1 部分），因为把未来自己视为“他人”虽然在文献中有所支持，但一来在常识理解上可能难以让人难以接受（如第三位评审人所言的“将未来自我视为他人是说不通的”），二来推导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逻辑其实可以完全不借助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正如您所言，传承动机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恰恰是因为觉得未来更近了（与未来的心理距离变小了）。当然，我们在新的稿件中进行了更加详细的陈述（希望它能够令您满意），具体如下：

“研究表明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关键在于缩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结感。比如通过“年龄渐变术”可以让个体感受到自我是如何随着时间稳定的渐变，于是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距离显得不再遥远(Hershfield et al., 2011)。本文认为传承动机会通过缩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提升人们对未来自我的联结感。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强调要将当下自我有关的信念、价值观等延伸至未来，以便自我在未来可继续存在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Wade-Benzoni, 2019)。这意味着个体希望自我在时间维度上尽可能的延长，这种希望会促使个体在当下就去考虑“我”在未来将会怎样，未来的我会如何被评价与铭记，于是未来的那个“我”被纳入到当下的考虑范畴。由此“未来我”因传承动机的激活而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不再遥远，于是二者之间也更可能被感知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因此，启动传承动机会促使个体缩短“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下的我感知到“未来我”不再遥远。

假设 1：传承动机会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感知。”

至于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弱化风险偏好的可能性,我们也基于您的建议重新梳理了风险的定义与理论,然后提出了二者的逻辑推导过程,具体可见新文稿的“1.3 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金融冒险行为”部分,囿于篇幅,我们不再这里重复黏贴。

最后,您提出传承动机是否有可能激活个体的死亡概念,进而弱化风险。我们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理论思考,并补充了相关的实证数据。首先,我们想向读者说明传承概念与死亡凸显的概念并不是同一个概念,传承的心理并不必然会涉及到死亡的概念,二者之间是独立的存在。理论上,对死亡的焦虑恐惧仅仅是个体产生传承动机的原因之一

(Wade-Benzoni et al., 2012), 后者还可以在多种与死亡无关的情境下被激发,比如即将离任的领导更会考虑如何行事才有可能在组织中留下自己的印记 (Sligte, Nijstad, & De Dreu, 2013)。实证上,我们有偿招募 202 位成年人(男性 81 名,平均年龄 31.02 岁)分别回答已有的个体差异层面的传承动机倾向量表与死亡焦虑倾向量表,预期通过因子分析从实证层面验证传承动机与死亡焦虑分属两个不同的构念。八个测项的传承动机倾向量表来自现有研究 (Zaval et al., 2015), 如“我希望在我死后,我将被后人长久的铭记”,“我在乎后人想起我时会怎么想”等($\alpha = 0.89$); 六个测项的死亡焦虑倾向量表同样来自现有研究(Wittkowski, 2001), 如“只要想到“一旦我死了,那我所有的思想和感情都随之消失”,我就害怕”,“想到有朝一日我终会死去,就觉得不安。”等($\alpha = 0.97$)。探索性因子分析显示共获得两个因子,旋转后的总方差解释率达到 72.31%,且每一个测项都分别归属于它们各自应该归属的因子上。两因子结构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同样表明了传承动机与死亡焦虑分属于两个不同的构念 ($\chi^2/df = 2.44$, CFI = 0.95, NFI = 0.93, NNFI = 0.95, RMSEA = 0.084)。

上述的实证与理论补充也在新文稿的“6.2 理论贡献”部分的第三段。

就我们所知,截止到目前为止尚未有文献表明启动个体的传承动机会激发死亡概念。反之,恰恰是死亡概念的凸显激发了传承动机 (Wade-Benzoni et al., 2012)。其次,我们依然是重新分析所有实验中人们撰写的关于传承动机启动任务的内容,结果并没有发现人们会普遍撰写跟死亡相关的词语(当然,也不排除人们是有激活死亡概念,但并没有撰写出来)。第三,关于传承动机是否会激发个体的死亡概念,进而弱化冒险倾向的可能性。通过查阅文献,发现恰恰与我们常识相反,凸显死亡概念反而会促使个体更有可能从事一些冒险行为,比如赌博时更加冒险(Hart, Schwabach, & Solomon, 2010); 更有可能从事危险驾驶等(Ben-Ari, Florian, & Mikulincer, 1999; Miller, & Mulligan, 2002; Rosenbloom, 2003)。

总结之，传承动机与死亡凸显是两个不同的构念，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不太可能是通过激活死亡概念的作用机制。

意见 4: 4.1、实证部分的最大问题在于，作者对结果的统计分析是不合理的，A、B、C 三种选项之间的风险差异是不等距的，因此，被试的选择无法等距地反映出他们的冒险程度？在统计上不可以将三种选择赋值为 1、2、3，因而无法做方差分析。正确的方法是使用卡方检验等。鉴于该问题，研究结果和结论的可信度存在较大疑问。

4.2、研究 1 的操纵检验 p 值没有给出对应的效应量。另外，后文中有些地方给出效应量，但仍有一些地方遗漏。

4.3、研究 1 及其他部分有些的统计值请统一为两位小数，例如，21 岁、20 岁、 $p = 0.05$ 。

4.4、研究 2 作为检验主要效应的第一个研究，使用为他人做决策情景不够恰当。从自我连续性的理论推导来看，传承动机指向未来、指向他人，因此将“未来自我”拉得更近，提高了未来自我连续性。但研究 2 却使用了为他人做决策的情景，这和之前的理论推导不相符，当人们更多地考虑未来自己的福祉时，为何给他人做出更保险的选择？其中起作用的机制是否还是研究者所探究的未来自我连续性？还是未来他人连续性？

4.5、研究 2 测量了未来导向，但没有报告两组未来导向的数值及有无显著差异，以及控制未来导向之后，仍存在的效应大小。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接下来我们详细回应上述相关问题。

4.1、我们重新使用了卡方分析来考察传承动机与风险偏好的关系，结论并没有改变，即传承动机确实弱化了个体选择高风险选项的可能性。此外，我们还重新补充了一个实验并作为研究 2a，补充该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将结果变量的测量变为连续型变量，然后用方差分析重新检验传承动机与风险偏好的相关性；其次，针对您第四点讲的第一个主效应的研究采用为“他人”做决策的实验场景的问题，我们现在的研究 2a 是以为自己做财务风险决策作为研究情境，更符合了理论推导。

4.2、我们补充了所有的研究中的效应量问题。

4.3、全文只要涉及到统计分析的，我们全部保留小数位两位。

4.4、感谢您提出的关于为自己决策与为他人决策差异的意见！如同上面所言，我们补充了一个新的实验作为研究 2a，该实验的场景是为自己做决策。此外，我们在新的文稿里面不再强调为自己做决策与为他人做决策的差异性。本质上，本文的为他人做决策实际上还

是为自己做决策，因为自己是作为经理人为公司购买理财产品，但决策的主体还是自己。所以现在文中我们已经不再强调自己与他人的差异，而且也确实不存在自我与他人的差异。

4.5、我们补充未来导向相关的统计分析。具体而言，即使控制住未来导向，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中介作用依然存在($\beta = 0.11$, $SE = 0.057$, 95% $CI = .03$ to $.26$)。为排除未来导向的替代性解释，我们首先考察传承动机对未来导向的影响，结果显示传承动机并不影响个体未来导向感知的差异($M_{\text{legacy}} = 5.17$, $SD = 0.87$, $M_{\text{control}} = 5.06$, $SD = 0.99$; $F(1, 108) < 1$, $p = .54$)。其次，将未来自我连续性替换为个体未来导向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未来导向无法中介传承动机对个体金融冒险行为的作用($\beta = -0.0062$, $SE = 0.02$, 95% $CI = -.08$ to $.01$)。

意见 5: 研究 3 把调节聚焦作为一个竞争假设，但没有提供理论上的支持。从理论上讲，传承动机会如何影响调节聚焦？另外，作者测量的是特质性促进定向与防御定向，如“我经常思考在我的人生中如何才能避免失败”，特质性得分是否能准确捕捉实验中状态性变化？

回应: 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因为综合考虑了三位评审人的意见后，我们重新做了一个实验 3，探讨了个体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对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调节，而不再考虑儿时 SES 的调节作用。在新的实验 3 中我们就没有测量调节聚焦这个概念，因为确实如您所言，传统的调节聚焦量表都是用来测量个体特质差异的，且测项数目较多（10 个测项，Haws, Dholakia, & Bearden, 2010）。在原稿测量调节聚焦时，我们在引导语那里倒是强调了根据“此时此刻”的感受来回答下面的问题，但没有发现结果可能还是源于测项的问题。

至于调节聚焦本身是否是可以作为竞争性解释。首先，本文提出的中介机制是未来自我连续性，在新的文稿中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论证该中介的合理性之外，还提供了较为丰富的实证证据，而且本研究也排除了诸多的其他可能性，包括自尊、自我重要性、情绪、印象管理，未来导向等各种可能性。其次，我们仔细阅读了一些研究调节聚焦的文献(Zhou & Pham, 2004)，发现在部分文献里直接将风险偏好作为测量调节聚焦类型的一种方式，也就是说个体规避风险是防御聚焦的一种体现。所以未来实际上是可以把调节聚焦类型作为结果变量，把风险偏好作为其中一种测量方式，但这个可能已经超出本文的研究范畴。综上所述，我们新的文稿里没有再测量特质性的调节聚焦，但把它作为竞争性解释放在了讨论部分。希望这样的处理与上述说明能够满足您的意见。

意见 6: 作者提到，研究 3 的目的之一是考察传承动机对金融冒险行为的影响是否会受到决策实施对象的调节。这一说法不够准确，要想探究决策对象的调节作用，应该在同一研究中既设置为自己决策组也设置为他人决策组，探测变量间的交互作用。

回应: 我们完全同意您的这个说法！从实验严谨性的角度，如若探究决策实施对象的系统性影响，确实应该在同一个实验中将其作为变量来处理。

但鉴于理论上，我们认为本文所探究的传承动机效应应该不受决策实施对象的影响，所以在现在新的文稿里，我们已经完全排除了为自己决策与为他人决策的说法。再次感谢您的严谨意见！

意见 7: 研究 2 和 3 中对金融冒险行为的测量，都是要求被试在期限为 1 年的理财产品中做选择，收益或亏损反映在未来，如果换用立即产生决策结果的选择，还会出现相同的效应吗？

回应: 非常感谢您提出的建设性意见，这一点确实是一个值得深思的意见。我们在开始设计实验时，倒确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于是为了让效应得以出现，故意将场景设置为“为期 1 年的理财产品选择”。

首次，如果从理论本身出发：传承动机缩小了当下自我状态与未来自我的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从而使得个体厌恶风险。那么不管这个未来是一年后的未来，还是立即产生决策结果的下一个时刻，应该是会有相同的效应。因为在我们看来，即使是当下做决策并立即产生结果，其实结果的出现都是在未来，都是一种相对于此时此刻的未来，毕竟时间是从不停歇的。所以即使立即产生结果，它也是符合风险敏感性理论里面提到的个体风险取决于当下状态与未来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所以在理论层面，传承动机弱化个体风险偏好应该不会受到您提及的这个决策类型的影响。

其次，考虑到您提出的这个建设性意见，我们在专门补充的实验 2a 中，就弱化了为期 1 年的说法，只是笼统的说要在两个收入不同但风险也不同的工作中进行选择，然后得到了与已有实验同样的结果，所以新的实验的结果可能能够在一定程度支持上述的回应。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洞见与细心！您的系列意见让我们对整个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了更多的思考，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您再批评指正，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完善与修订！

.....

审稿人 3 意见：

研究现在自我与未来自我之间的关联是一个有意思的研究问题，并将其拓展到消费者的金融决策也有现实的借鉴意义。但是论文在概念上以及在逻辑的论证上还需要继续完善。

意见 1：传承动机有两个要素：一是未来，二是他人，是指在未来对他人产生影响。但是在文中的很多地方，都将未来的自我视为他人，这与传承动机的定义存在严重的不符。而且将未来自我视为他人也与本文的假设相悖，因为基本假设是传承动机通过影响自我连续性影响决策，自我连续性就是指“将未来的自己视为自己而非他人”，所以，在文中多处将未来自我视为他人是说不通的。

回应：非常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让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首先，在第一稿的传承动机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推导过程中，我们论述了传承动机的两个特性（时间维度的关注未来，与人际维度的关注他人），并从这两个特性出发探讨它如何提升个体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降低个体风险偏好。评审意见回来后我们发现包括您在内的评审人或直接或间接的表示出该推导过程的复杂性，且依据传承动机两个特性的推导逻辑也给读者带来理解上的难度。

综合您的意见，经全体作者再三讨论，现在我们在论述传承动机概念本身时，就不再特别强调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见新文稿的 1.1 部分）。因为把未来自己视为“他人”虽然在文献中有所支持，但一来在常识理解上可能难以让人难以接受（如您所言的“将未来自我视为他人是说不通的”）。二来该说法确实如您所言，它会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机制会有所混淆。最后，由于推导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逻辑其实可以完全不借助传承动机的人际维度，所以我们在您的建议下取消了任何有关“未来自我”等同于“他人”的论述。

在新稿中传承动机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的论证逻辑如下（希望它能够令您满意）：

“研究表明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关键在于缩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强化二者之间的联结感。比如通过“年龄渐变术”可以让个体感受到自我是如何随着时间稳定的渐变，于是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距离显得不再遥远(Hershfield et al., 2011)。本文认为传承动机会通过缩减未来我与当下我之间的心理距离来提升人们对未来自我的联结感。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强调要将当下自我有关的信念、价值观等延伸至未来，以便自我在未来可继续存在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Wade-Benzoni, 2019)。这意味着个体希望自我在时间

维度上尽量的延长，这种希望会促使个体在当下就去考虑“我”在未来将会怎样，未来的我会如何被评价与铭记，于是未来的那个“我”被纳入到当下的考虑范畴。由此“未来我”因传承动机的激活而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不再遥远，于是二者之间也更可能被感知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因此，启动传承动机会促使个体缩短“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下的我感知到“未来我”不再遥远。

假设 1：传承动机会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感知。”

意见 2：在既有文献中，对于自我连续性影响消费者决策已有比较成熟的研究。所以本文如果有创新，也是在传承动机的引入。但是传承动机对自我连续性的关系好像并不是文中所说的那么简单。传统动机看重未来对他人的影响，这里面也包含对现有自我的改变，如果当前的自我有某些不良行为，或者碌碌无为，那么激发传统动机应该是促进他们的自我改变以及未来自我与当前自我的决裂。所以，为什么传承动机会直接促进和提高自我连续性，这里在文中并没有讲清楚，而且与现实也不符。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我们从两个方面对该意见进行回复。

首先是关于理论创新的回应。我们最重要的创新是引入传承动机，并探讨它如何通过未来自我连续性影响风险偏好。如您所言，过往有些文章研究了未来自我连续性对消费的影响，但就我们所知，确实尚未有直接证据表明未来自我连续性会如何影响风险，这也是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拓展。具体关于本文的理论创新可参看新文稿的“6.2 理论贡献”部分。

其次是关于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关系。非常感谢您的洞见！我们完全同意您提及的可能有因素会调节传承动机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本文正是基于此考察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这个调节作用我们在假设 3 推导部分进行了详细论述，该变量的引入正是基于您后面的第四个意见，我们期待该变量的引入与假设推导的逻辑能够令您满意：

“如前所言，传承动机在时间维度上通过将未来自我纳入当下考虑范畴，从而提升未来自我连续性。此效应的发生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即人们对当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从而才可能愿意将当下自我延伸到未来。试想，如果自我对当下自己的状态是消极否定的，那么个体更有可能期望自己能够改变当下状态，而非将负面的当下自我延伸至未来。比如 Yang 和 Urminsky(2015)就发现悲观/乐观状态下的个体会因为当下自己的消极/积极状态而倾向于降低/提升与未来自我的联结。与本文相关的是，社会经济地位就是影响个体对当下自我满意度的一个重要变量。高社会经济地位者由于掌握更多的资源，拥有更强的掌控感，因此对当下自我持有积极正面态度，会倾向于在未来继续维持当下的高社会地位(Joshi & Fast,

2013)。于是提升此类群体的传承动机，他们会愿意继续将当下积极自我延伸到未来，进而获得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反之，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往往缺乏资源与控制感，并且时常遭遇自我威胁，此类群体寻求的是在未来可以改变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因此他们并不期望将当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Joshi & Fast, 2013)。我们可以推断即使启动低社会经济地位者的传承动机，他们也无意愿将当下自我与未来自我建立联结。结合前文的假设 1 和 2，本文有如下假设：

假设 3：个体社会经济地位的提升会强化传承动机对来自我连续性的作用，进而影响金融冒险行为。”

但我们在您的启发下，在讨论部分针对您的意见进行了关于传承动机到来自我连续性的调节作用的补充说明，具体论述如下（我们把下面的讨论放在了最后的讨论部分，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将它放到前面的假设 3 部分进行补充说明，我们会继续修订）：

“最后，本文还发现传承动机对来自我连续性的影响会受到个体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正常情况下，人们一般会对自我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甚至变为过度自信(Johnson & Fowler, 2011)，所以对当下自我拥有积极评价的人们才可能在传承动机的作用下把积极自我延伸至未来。但对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个体而言，他们的目标在于改变当下状态，并不愿意将当下消极自我延伸至未来。所以传承动机对来自我连续性的提升作用在此类群体身上体现的并不明显。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预示着在未来研究中可以考虑更多的会调节传承动机影响来自我连续性的因素。”

人们一般都是对自己持有积极评价(Leary, 1999)，所以启动传承动机才会导致高的未来自我连续性。为此，我们也重新分析所有实验中传承动机启动组的参与者所撰写的开放式问题（你希望后人会记住你的什么呢？）的答案。发现普罗大众并不会因为自己的普通而在思考传承问题时，而让自己觉得有愧疚，比如愧疚自己的碌碌无为等。他们反而是更多强调自己的良善，自己的个性，或者自己的某个良好品质能够被传承。总结之，正常情况下，启动个体的传承动机并没有让人们产生低自尊的感知（可参看实验 1 和实验 2a 中关于传承动机对自我重要性评价和自尊的影响）。

意见 3：在既有文献中，研究的都是传承动机对他人的影响，例如慈善，比如承担责任，涉及的是消费者自我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这与传承动机的概念是一致的，因为传承就是对他人产生影响。那么，本文将其延伸到自我决策，有没有理论基础，这在文中并没有看出来。

回应：感谢您的意见！前人关于传承动机的研究确实是主要围绕他人导向的范畴，而本文恰恰是想从传承动机对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拓展的角度来作为切入点。

您提出的理论基础问题应该是我们在第一稿时没有非常好的组织理论与进行逻辑推导的关系而导致的批评。现在，综合各位评审人的意见以及全体作者百分百的付出，我们重新论述了传承动机与风险的概念，并重新撰写了传承动机如何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后者如何影响个体风险偏好（可见文中三个假设的推导过程），相信新的文稿在理论性和逻辑性上都得到大幅提升。当然，也希望我们的修改工作能够达到您的要求，也请您继续批评指正！

意见 4：很多假设的推理并不严密。比如 H1 传统动机与自我连续性。传承动机为什么为强化当前自我与未来自我的心理联结？如上所述，如果当前自我与未来的理想自我有很大的差距，消费者会产生在未来改变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强化两者之间的关联。再者，为什么童年的情况会有调节作用而不是现在的情况？童年代表的是消费者的过去，所以引入童年又把过去的情况引入研究，增加了论证的复杂度。一个人的过去要通过影响现在才能影响未来，而不是在文中直接将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再就是，童年情况的调节作用在论证的过程中并没有将“调节”体现出来，更像是论述它对自我连续性的直接影响。

回应：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上述意见主要是关于假设 1 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作用。下面我们就此分别作出回应。

首先，关于假设 1 的推导，相信我们在前面的意见 2 那里作为较为详细的论述，在此不再赘述。欢迎您就我们的新文稿继续提出批评和指正。我们会虚心接受并继续认真修订。

其次，关于童年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我们同意您提出的论证复杂性的意见，为此在您的意见下，我们重新设计了实验 3，将童年社会经济地位改为当下的社会经济地位。具体的假设推导过程见上面意见 2 的回复过程。

意见 5：在研究一中，排除自我重要性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是这没有考虑到未来。应该是“未来的自我重要性”。从当前看，主要是考察当前的自我重要性，当然它与传承动机以及自我连续性之间没有什么关系。

回应：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在研究 1 中我们确实是测量当前的自我重要性，我们在新增加的实验 2a 中还增加了此时此刻的自尊的测量。在这里我们想澄清下测量当下自我重要性和自尊的原因。

(1) 如您所言, 以往的传承动机研究大部分都是考察它对他人导向行为的影响, 而很少涉及到它如何影响个体的自我感知。所以我们想多方面探讨传承动机对自我会如何影响, 比如对自我评价/自尊的影响, 对自我连续性的影响, 甚至对自我概念清晰度(Self-concept clarity; Campbell et al., 1996)的影响(我们在另外的研究中考察的变量)。其中自我重要性/自尊是自我的整体评价的维度, 自我连续性是自我的时间维度, 自我概念清晰度是自我的结构(Structure)维度。总而言之, 我们想全方位探讨传承动机对自我的不同维度的影响。

(2) 我们是把自我重要性和自尊放在跟自我连续性并列的位置来考察传承动机的影响, 而不探究该动机是否会通过自我重要性来影响自我连续性。所以如您所言, 自我重要性和自我连续性确实没什么关系。但自我重要性跟传承动机有无关系却不一定, 正如我们在文章中所言:

“在启动传承动机过程中参与者要完成“自己如何被后人记住的思想任务”(下面有具体的关于启动过程的介绍), 而个体通过思考自己可被后人铭记的点有可能会对自我的某个特征进行确认与肯定, 比如参与者会表示希望自己正直善良的个性能够传承给未来的孩子, 比如参与者希望自己能够做出一些对社会有贡献的事业, 等等。以往研究已经表明这种撰写自己某个方面值得肯定与称赞的过程可以称之为“自我确认”(Self-affirmation), 它会提升个体的自尊水平(Park, 2007), 而自尊又会弱化个体的金融冒险行为(Duclos, Wan, & Jiang, 2013)。”

所以我们有必要去考察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个体的自我重要性评价和自尊。

(3) 我们考察自我重要性和自尊的原因还在于, 以往研究表明它们可能会影响个体的金融冒险行为(Duclos, Wan, & Jiang, 2013), 所以为更好说明传承动机是通过自我连续性的中介影响个体金融冒险行为, 而非通过自我重要性或者自尊的中介作用, 我们才测量了它们。您提出的未来的自我重要性值得我们深思, 但把这个未来的自我重要性视为跟未来自我连续性并列的中介变量(中介传承动机到风险偏好的过程), 还是把它视为中介了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的中间变量却值得商榷。但似乎无论是哪种处理方法, 都会让理论的推导过程变得更加的复杂, 比如似乎很难说传承动机的启动任务会提升个体的未来的自我重要性, 既然它都不会提升当下的自我重要性。

意见 6: 文章的理论贡献还需要很好地提炼与中介。另外文章的管理意义也需要指出来。传统动机即使会影响个体决策, 那么如果在实践当中运用呢? 如何操控呢?

回应: 感谢您的批评与指正! 在您的意见下, 我们重新梳理了文章的理论贡献, 具体可见 6.2 理论贡献部分。在这里我们再简要归纳下本文的理论贡献点: (1) 本文对传承动机的贡

献首先是拓展其研究领域，在金融风险情境发现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2）传承动机影响未来自我连续性的发现既为传承动机影响自我首次提供了证据，也为未来自我连续性找到了新的来自动机视角的前置因素；（3）本文发现未来自我连续性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研究的拓展；（4）本文也丰富了个体金融风险行为的现有文献。整体而言，我们相信本文的研究发现对现有文献来说还是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量贡献。

关于您提及的实践启示的内容，我们在最初投稿时是有专门的章节来探讨这个内容，但学报编辑部建议删除，所以您就没怎么看到我们对实践启示的讨论。在此次新文稿中，我们加上了这个部分的内容。此外，我们也在研究不足那里提到了本实验都是属于实验室实验，未来可开展现场实验，与保险公司合作开发带有传承理念的理财产品广告，从而考察传承动机对人类真实行为的影响。但实事求是而言，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理论上的考虑，确实在实践启示方面也仅能称之为启示。

最后，再次感谢您的洞见与细心！您的系列意见让我们对整个论文的理论深度有了更多的思考，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满足您的要求！如有不到位的地方，欢迎您再批评指正，我们愿意进一步的完善与修订！

参考文献

- Ben-Ari, O. T., Florian, V., & Mikulincer, M. (1999). The impact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ckless driving: A test of terror management mechanism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6(1), 35-45.
- Campbell, J. D., Trapnell, P. D., Heine, S. J., Katz, I. M., Lavallee, L. F., & Lehman, D. R. (1996). Self-concept clarity: Measurement, personality correlates, and cultural boundarie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1), 141-156.
- Duclos, R. , Wan, E. W. , & Jiang, Y. . (2013). Show me the honey! effects of social exclusion on financial risk-taking.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1), 122-135.
- Hart, J., Schwabach, J. A., & Solomon, S. (2010). Going for broke: Mortality salience increases risky decision making on the Iowa gambling task.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49(2), 425-432.
- Leary, M. R. (1999). Making sense of self-esteem. *Current directions in psychological science*, 8(1), 32-35.
- Miller, R. L., & Mulligan, R. D. (2002). Terror management: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and locus of control on risk-taking behaviors.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3(7), 1203-1214.
- Mishra, S. (2014).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biology,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8(3), 280-307.
- Mishra, S., Barclay, P., & Sparks, A. (2017). The relative state model: Integrating need-based and ability-based pathways to risk-t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1(2), 176-198.
- Park, L. E. (2007). Appearance-based rejection sensitivity: Implications for mental and physical health, affect, and motivation.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3(4), 490-504.
- Rosenbloom, T. (2003). Sensation seeking and risk taking in mortality salienc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5(8), 1809-1819.
- Sligte, D. J., Nijstad, B. A., & De Dreu, C. K. (2013). Leaving a legacy neutralizes negative effects of death

- anxiety on creativit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9(9), 1152-1163.
- Wade-Benzoni, K. A., Tost, L. P., Hernandez, M., & Larrick, R. P. (2012).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Death, legacies, and intergenerational decision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3(7), 704-709.
- White, K., & Peloza, J. (2009). Self-benefit versus other-benefit marketing appeals: Their effectiveness in generating charitable support. *Journal of Marketing*, 73(4), 109-124.
- Wittkowski, J. (2001).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ltidimensional orientation toward dying and death inventory (MODDI-F). *Death Studies*, 25(6), 479-495.
- Zhou, R., & Pham, M. T. (2004). Promotion and prevention across mental accounts: when financial products dictate consumers' investment goal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31(1), 125-135.
- Zaval, L., Markowitz, E. M., & Weber, E. U. (2015). How will I be remembered? Conserving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sake of one's leg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2), 231-236.
-

第二轮

审稿人 1 意见

意见 1: 第一轮修改作者还是付出很多努力。论文的质量有很大提升。但是这篇论文的最大问题：传承动机并非人人都有，而是只有极少人才有的。而且一般而言，普通人要实现青史留名，必须要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为什么会保守？如果保守岂不是泯然众人了？所以基本的逻辑传承动机会导致保守决策从这个视角看有点不通。

回应: 首先感谢您对我们第一轮修改工作的认可，我们会继续努力做好第二轮意见的修改。针对您关于传承动机并非人人都有，而且普通人要想青史留名，必须要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也就不容易产生保守决策的疑问，我们做如下的解释与说明。

第一，针对这点疑问，全体作者进行深入反思，为何我们的写作让您有此疑问。我们认为最大的原因可能是我们在引言的第一段没有充分的对论点“传承动机是否人人都有”进行充分的阐述，而且又用了诸如“期待不朽、被人铭记、精神永生”等“大词”，导致读者很容易想到要“不朽”，要“永生”是不容易实现的，也是需要作出与众不同的事情。想想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能够被后人铭记的人物无不是丰功伟业。

在您意见启发下，为了补充说明传承动机的普遍性与常人特征，我们充分阅读文献，先在这里与您交流关于“传承动机普遍性”的观点。

(1) 从传承动机的来源上来看。传承动机意指个体希望自我能够在时间维度上获得长久性价值，让个体获得抽象意义的不朽。人类之所以产生传承心理，是源于它可以缓解死亡带来的焦虑感，以及可以帮助个体实现人生意义感(Hunter & Rowles, 2005)。我们每个人都会想要逃避生命的消逝，并对此产生恐惧和焦虑(Greenberg et al., 1990)。恐惧管理理论(Terror

Management Theory)的研究指出惧怕死亡、死亡焦虑感是个体心理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 (Burke, Martens, & Faucher, 2010)。人类作为生物物种与其他物种的区别之处在于我们能够清晰意识到自我在求生与生命终究消逝之间的挣扎与冲突,并由此引发了生存焦虑。人类发展出了多种的防御系统 (Defense system) 来抵御这种生存焦虑 (Greenberg et al., 1990),其中一个重要途径就是通过寻求某种形式的不朽,即想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与自我相关的某种印记,并且该印记能够长久的存在于后人的记忆当中,这便是个体传承动机的重要来源 (Burke et al., 2010)。可见,传承的重要性在于它提出了人类存在一种巨大的可能性,即把我的部分表征延续至未来,从而使得我们能够消除因死亡恐惧带来的不适感,实现抽象意义的不朽。总结,正是由于死亡以及因死亡引起的焦虑问题是每个个体都需要面对的问题,所以 Hunter 和 Rowles (2005)才会断言近乎所有的人类都会有传承的需要,只是人们用来实现传承的方式会因文化的不同而不同。关于如何实现传承的方式,我们会在后面进行进一步的详述。

(2) 从已有的实证证据来看。已有的系列实证研究也表明研究者可以通过问卷来测量个体层面的传承动机的差异,以及通过情境来启动传承动机 (e.g., Zaval et al., 2015; Bang et al., 2017),这些已发表的研究表明传承心理作为一种动机是存在于普通人身上的,而且可以通过情境将其暂时提升到高水平状态。实际上,我们也已经在中国和美国(通过 Mturk 在线数据收集平台)开展了超过四十项的有关传承动机测量与启动的实验。另外,在我们近期一项研究中测量了大学生(N = 130)的传承动机水平,发现在七点量表上其均值达到 4.98 分(分值越高代表越具有传承动机倾向)。基于 Erikson (1963) 的自我统合(Ego integrity) 思想,发展心理学家发现从中年这个生命阶段开始,个体关于自我传承的意识和动机得到蓬勃发展 (Hunter & Rowles, 2005)。可能中国文化对传承价值观的重视,使得年轻人如大学生群体也具有了较高水平的传承动机。总而言之,上述证据表明个体普遍存在传承动机。

总结,因为行文关系,我们此前未能在引言部分对传承动机的普遍性予以充分的论证。感谢评审人提出这个不足,我们现在引言第一段进行了补充说明(红色部分为新增加内容):

传承的思想深植于中华文脉之中,如《左传》就提出“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实践。传承的思想在日常生活中也随处可见:从修建宗祠、家谱到著书立说,从文人骚客的摩崖石刻到常人百姓的“到此一游”。这些事例除了表明传承心理并不只是少数“重要人物”的特有心理,而是常人百姓共同的需要之外;它还表明人们实现传承的方式除了通过丰功伟绩等对社会有重大贡献外,还可以有诸多的其他实现方式,简单如像给后代传承物品、价值

观或者人生故事等 (Price, Arnould, & Curasi, 2000)。所以说传承心理是常人们普遍存在的一种动机(Hunter & Rowles, 2005)。

囿于学报有关篇幅的限制,我们无法在正文部分给予更多详细的论证,只能在引言部分做如上内容的添加。此外,我们也在“6.2 理论贡献”部分的第一段进行了补充说明,添加内容如下(红色部分为新增加内容):

“本文推进了我们对传承动机的理解。正如 Hunter 和 Rowles(2005)所言,近乎所有的人类都会有传承的需要,因为它可以帮助回答我们“为何存在”的问题。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个体动机,它对人们的心理与行为产生了各方面持久性的影响(e.g., Wade-Benzoni & Tost, 2009)。”

第二,关于普通人拥有传承动机后,他们会想要青史留名,以及必须要做出一点与众不同的事情,也就不容易产生保守决策的疑问。我们做如下解释与说明。

(1) 传承动机启动后,个体实现传承的方式多种多样。例如,伟人改变世界,富人捐资建楼,普通人著书立说,又或者向后代传承物品、价值观、人生故事,等等。Hunter 和 Rowles (2005) 根据传承内容划分了三种传承类型——生物传承、物质传承以及社会传承。生物传承的内容包括血统、血缘和基因等。例如父母会将子女看成自己生命的延续,进而会考虑子女的福祉和利益,以延续其生物传承 (Lubatin et al., 2005)。物质传承的内容包括金钱和财产等,例如人们会将自己的财产和所有物通过订立遗嘱的形式传承给子女或者捐赠给非营利组织。社会传承的内容包括价值观、社会联结和社会关系等,它会促使个体保持对非物质财富以及社会精神价值等的关注 (McKenny et al., 2012)。实际上,一切能够代表有价值的、抽象自我的内容物都可以成为自我传承的载体 (Belk, 1988; 2013)。

从上面理论论述可以看出,青史留名只是个体实现传承的一种方式,且只是少部分人才会提及的方式。在实证上,传承动机的启动任务是参与者需要花费 2 至 3 分钟完成一个主题为“你希望后人会记住你的什么呢?”的文字撰写任务。因此我们可以对实验参与者提供的答案进行编码,来确定人们想要实现传承的表达方式都有哪些。结果显示绝大部分的参与者表示自己作为普通人,可能无法像伟人一样做出对社会,对历史有重大影响,重大贡献的事迹。他们希望能够传承给后人自己的道德表现(如捐赠,环境保护,支教,等等),积极正面的精神(如自己的行为处世,待人接物,善良的品性,等等),某种对社会有用的角色(如教师、作家,科学家等)。作为普罗大众中的一员,众多参与者表示实现传承的方式不是丰功伟绩,而是某种小确幸,又或者仅仅只是笼统希望通过自己的表现可以让后人铭记。下面,我们罗列若干有代表性的例子来呈现普通大众眼中的传承方式。

典型案例 1：“作为一个普通人我的力量很弱小，但是我觉得可以从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为后代留下一些积极影响，比如保护环境，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丽的世界，少丢一些垃圾保护环境，虽然是很微不足道的事，但是一步一个脚印总会有收获。”

典型案例 2：“比起物质上的影响，我更希望我能够给后世的人留下精神上的影响。我只是一个普通人，因此我的影响可能的最大受益者应该就是我的子女，我希望我能够做一个有道德，善良的人，教育我的子女，让他们也能够善良的活在这个世界上。”

典型案例 3：“我的妈妈是一名老师，她曾经说过一句话让我受益匪浅，就是人活在世上，就是要为后世留下什么意义的东西，将来你走了，但你留下的东西还在发挥作用，这辈子就没有白过，也会被后人所铭记。因此我也想像我的妈妈一样。”

典型案例 4：“先贤曾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因而人生一世，必当留下一些东西。而对于我们这样天资平庸的普通人，也许终其一生也无法达到圣人那样的高度。那么我们能给世界留下的是什么呢？窃以为，留给世界的不一定是丰功伟绩，只要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有一份热，发一份光，尽我自己的力量影响周围的人，比如努力，比如勤奋，比如乐观，比如积极。只要能影响到一点点，让世界变好一点点，我的人生就是有意义的。”

(2) 关于传承动机启动后个体是否会从事与众不同的事情，也就不容易产生保守决策的问题。现有研究表明个体要实现传承，必然是要通过自己所属群体对自己的认可，认同甚至铭记来实现的，也就是说个体的言行大概率上是要被自己的文化价值观，社会规范所允许 (Wade-Benzoni, 2019)。而“与众不同”在很多时候是与大家所熟悉的规则、规范、价值观相背离。所以理论上传承动机启动后个体并不必然会从事与众不同的事情。在我们开展的另外一项关于传承动机与口碑传播研究中，我们发现传承动机并不会促进人们去表达自己的少数派意见，即如果自己的意见与大部分人相反（属于少数派意见），那么传承动机也无法提升该少数派意见的表达。少数派意见表达可以视为“与众不同”这一概念在意见表达领域的具体体现 (Rois, 2012)。

当然，您的意见也暗含着是否存在某种可能性使得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个体的风险偏好。我们完全同意存在这种可能性，毕竟任何心理效应都可能存在边界条件，甚至出现逆转的情况。具体到本研究，可能具有某种特殊人格特质的个体，如雄心壮志者，如对独特性的需求特别高的人 (High need for uniqueness, Tian, Bearden, & Hunter, 2001)，又或者将冒险视为自己生活一部分的人 (Zhang, Highhouse, & Nye, 2019)，启动这些个体的传承动机有可能提升其风险偏好。此外，本文的风险情境为金融风险情境，考虑到风险具有情境独特性的特

征(Zhang, et al., 2019), 所以未来可以在其他领域考察传承动机对风险的影响。上述这两种可能性我们在未来研究部分进行了补充说明(见文章“6.4 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部分的标红内容), 具体如下:

“其次, 本研究只考察了风险行为中的财务风险, 考虑到风险行为具有情境独特性(Zhang, Highhouse, & Nye, 2019), 未来可以考察如社交风险, 新产品使用风险, 赌博行为(孙悦, 李纾, 2005) 等其他类型的风险行为。

第五, 本文发现传承动机弱化个体的风险偏好, 但未来研究可以考察是否存在某种特殊情况使得该关系得以逆转, 比如在具有某种人格特质(如独特性需求高的个体; Tian, Bearden, & Hunter, 2001), 持有某种信念的个体身上(冒险者: Zhang, et al., 2019), 或者在某些情境下传承动机的激活反而会提升人们的风险偏好。”

总结, 关于是否存在传承动机反而会提升人们风险偏好的可能性, 我们首先承认可能存在这种情况, 所以把它作为未来研究方向补充进文章的讨论部分。考虑到本文当前的故事/主要贡献是在文献中首次确认传承动机是否会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 以及可能的机制。那么只有当主效应确认后, 未来的研究才可以有进一步考虑的空间。所以我们在新增补的实验与正文里面就并没有去进一步考虑这种可能性, 因为它将完全改写本文的所有逻辑架构与写作。期望我们上述的解释与做法能够令您理解与谅解。

意见 2: 自我延续性到保守决策是既有文献已经研究的问题, 但是文献研究的背景是储蓄, 即为自己的将来进行储蓄, 但是为什么会在金融决策中保守呢? 所以, 建议论文将传承动机与自我延续性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和逻辑上理顺, 更加清楚通顺。

回应: 感谢您给予机会, 让我们有机会对文章的理论逻辑进行进一步说明与补充。为更好的阐述传承动机与自我连续性之间的关系, 我们拟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增强论证: (1) 概念上, 从传承动机与自我连续性各自的定义出发, 基于逻辑推导二者之间存在的额关系, 这也是目前已经用到的方法; (2) 实证上, 利用传承动机在跨代际决策领域(Inter-generational decision making)的研究结论来说明拥有传承动机的个体会关心对包括未来自我在的行动者(Actor)的福祉, 从而降低与未来自我之间的心理距离, 提升自我连续性感知。具体论证如下(红色部分为新添加内容):

“如前所言, 传承动机强调要将当下与自我有关的信念、价值观等延伸至未来, 以便自我在未来可继续存在并产生持久性的影响(Wade-Benzoni, 2019)。这意味着个体希望自我在时间维度上尽可能的延长, 这种希望会促使个体在当下就去考虑“我”在未来将会怎样, 未来的

我会如何被评价与铭记，于是未来的那个“我”被纳入到当下的考虑范畴。由此未来的我因传承动机的激活而变得更加的鲜活与生动，当下的我与未来的我之间的距离也变得不再遥远，于是二者之间也更可能被感知为具有更高的相似性与稳定性。因此，启动传承动机会促使个体缩短“当下我”与“未来我”之间的心理距离，当下的我感知到“未来我”不再遥远。除在概念上我们可基于逻辑推导传承动机与自我连续性存在关联外，已有的实证研究也有助于说明传承动机可以降低当下自己与未来自己之间的心理距离，进而提升自我连续感。跨代际决策研究发现具有传承动机的个体会更考虑为自己的后代谋福利，比如愿意将更多的资源分配给后代，将更多的负担（比如债务）留给自己（Wade-Benzoni, Sondak, & Galinsky, (2010)；比如为给后代留下美好生存环境而从事更多的环保行为(Zaval et al., 2015)，等等。由于后代在广义上也是未来自我的一种延伸形式(Hunter & Rowles, 2015)，因此我们会推断传承动机可以提升当下自己对未来自己的亲近感，进而降低二者之间的心理距离。

假设 1：传承动机会提升个体对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感知。”

您提及为何自我连续性在金融风险决策中是保守决策的问题。首先，正如您所言，在文献研究中发现自我连续性提高了人们的储蓄意愿(e.g., Hershfield et al., 2011; Joshi & Fast, 2013)，而储蓄行为可以被视为一种为了减少未来自我的金融不确定性，使未来自我免于金融困境而在当下实施的一种操作，因此储蓄行为可以部分视为个体规避金融风险的一种体现。故而在正文中也引用了自我连续性可提升人们储蓄行为来作为我们所提假设的证据(见假设 2 前面的论证内容)。但更为重要的是，我们从理论上提供逻辑证据链以及其他方面的实证结果来说明自我连续性可以降低个体在金融风险决策中的冒险行为。具体而言，首先是我们借助风险理论中的风险敏感性理论(Risk-sensitivity theory)，提出个体的风险偏好取决于个体的当下状态与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如此，消费者的风险偏好就转化为一个与自我息息相关的概念。根据风险敏感性理论，我们可以发现风险决策是一个与自我的当下状态和未来目标息息相关的一个决策。由于未来目标总是与未来的那个“我”相生相伴，所以结合自我的时间维度，风险决策就转变为取决于当下我的状态与未来我的目标之间的差距程度。然后我们从三个方面提出为何传承动机导致的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会降低消费者偏好风险的可能性，具体罗列如下：

“具体而言，(1)自我连续性意味着自我在时间维度上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确保未来自我与当下自我的各自状态与需求不会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结合风险敏感性理论，具有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更偏好低风险选项。(2)已有研究表明具有高未来自我连续

性感知的个体在为未来的那个我做选择时会跟当下这个我的选择保持一致，规避变化(比如选择同样口味的食物; Yang & Urminsky, 2015)。因此根据风险本身的定义(结果的变化范围)，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会选择低风险选项。(3)从现有一些研究中我们还可以间接推断未来自我连续性会降低个体的风险偏好，比如有研究表明高未来自我连续性感知的个体更愿意进行储蓄养老(Joshi & Fast, 2013)，更节俭(Bartels & Urminsky, 2015)等，这些行为都暗含着为了降低未来自我的财务风险而实施的一种风险规避行为。”

最后，我们想总结下整个论文的逻辑。首先，整个论文都是围绕自我这个概念展开论述。特别是新的文稿中我们基于风险敏感性理论 (Mishra, 2014; Mishra, et al., 2017) 提出了人们为何会规避风险或者偏好风险的机制。该理论认为个体的风险偏好也是源于当下自我状态与未来自我的期望目标之间的差距（具体论述可见“1.3 传承动机、未来自我连续性与金融冒险行为”部分）。由此，不管是传承动机的概念、未来自我连续性的概念，还是风险的概念，三者全部统一于“自我”这一主题。这使得整个论文有了一个清晰的主架构。

其次，在具体关于传承动机为何提升个体未来自我连续性，以及未来自我连续性如何影响人们的风险偏好上，我们这次新增了补充说明，特别是应您的建议，我们丰富了传承动机与未来自我连续性之间的理论推导过程。

最后，再次感谢您在此特殊时期内抽空评审我们的论文，真诚感谢！也希望我们的回复能够令您满意！

谨祝春祺

参考文献

- Bang, H. M., Koval, C. Z., & Wade-Benzoni, K. A. (2017). It's the thought that counts over time: The interplay of intent, outcome, stewardship, and legacy motivations in intergenerational reciprocity.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73, 197-210.
- Belk, R. W. (1988). Possessions and the extended self.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15(2), 139-168.
- Belk, R. W. (2013). Extended self in a digital world.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40(3), 477-500.
- Burke, B. L., Martens, A., & Faucher, E. H. (2010). Two decades of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a meta-analysis of mortality salience research.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4(2), 155-195.
- Erikson, E. H. (1963). *Childhood and society*. (2nd ed.). New York: Norton.
- Greenberg, J., Pyszczynski, T., Solomon, S., Rosenblatt, A., Veeder, M., & Kirkland, S., et al. (1990). Evidence for terror management theory ii: the effects of mortality salience on reactions to those who threaten or bolster the cultural worldview.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58(2), 308-318.
- Hershfield, H. E., Goldstein, D. G., Sharpe, W. F., Fox, J., Yeykelis, L., Carstensen, L. L., & Bailenson, J. N. (2011). Increasing saving behavior through age-progressed renderings of the future self.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48(SPL), S23-S37.

- Hunter, E. G., & Rowles, G. D. (2005). Leaving a legacy: Toward a typology. *Journal of Aging Studies*, 19(3), 327-347.
- Joshi, P. D., & Fast, N. J. (2013). Power and reduced temporal discounting. *Psychological Science*, 24(4), 432-438.
- Lubatkin, M. H., Schulze, W. S., Ling, Y., & Dino, R. N. (2005). The effects of parental altruism on the governance of family-managed firms.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26(3), 313-330.
- Mckenny, A. F., Short, J. C., Zachary, M. A., & Payne, G. T. (2012). Assessing espoused goals in private family firms using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questions: do private family firms discuss utilitarian and normative goals in their organizational narratives such as websites and press releases?. *Family Business Review*, 25(3), 298-317.
- Mishra, S. (2014). Decision-making under risk: Integrating perspectives from biology, economics, and psychology.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18(3), 280-307.
- Mishra, S., Barclay, P., & Sparks, A. (2017). The relative state model: Integrating need-based and ability-based pathways to risk-taking.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 21(2), 176-198.
- Price, L. L., Arnould, E. J., & Curasi, C. F. (2000). Older consumers' disposition of special possessions.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7(2), 179-201.
- Rios, K. (2012). Minority opinions: Antecedents and benefits of expression.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6(5), 392-401.
- SUN Yue, LI Shu. (2005). Risk perception and gambling behavior among Macau residents: An exploratory study. *Acta Psychologica Sinica*, 37(2): 260-267.
- [孙悦,李纾. (2005). 澳门人的风险知觉与赌博行为. *心理学报*, 37(2): 260-267.]
- Tian, K. T., Bearden, W. O., & Hunter, G. L. (2001). Consumers' need for uniqueness: Scale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Journal of consumer research*, 28(1), 50-66.
- Wade-Benzoni, K. A. (2019). Legacy motivations & the psychology of intergenerational decisions.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26, 19-22.
- Wade-Benzoni, K. A., Sondak, H., & Galinsky, A. D. (2010). Leaving a legacy: intergenerational allocations of benefits and burdens. *Business Ethics Quarterly*, 20(1), 7-34.
- Zaval, L., Markowitz, E. M., & Weber, E. U. (2015). How will I be remembered? Conserving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sake of one's leg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6(2), 231-236.
- Zhang, D. C., Highhouse, S., & Nye, C. D. (201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General Risk Propensity Scale (GRiPS). *Journal of Behavioral Decision Making*, 32(2), 152-167.
-

审稿人 3 意见

作者对评阅人的意见正确理解并对论文做了认真修改，补充理论和文献支持，并追加研究以完善研究的逻辑严密性。论文质量达到发表水平。

第三轮

编委意见：

作者根据评审专家的意见对文章进行了较好的修改，文章的质量有了明显的提升。目前存在一些小问题：(1)在回答评审人的问题引述过的一些关键文献没有在文章中讨论和引

用(比如 Burke et al., 2010; Belk, 1988; 2013), 需要补充; (2)在讨论风险决策有关的定义和理论时, 只引用了一两篇文献(比如, Mishra 等), 请进行仔细查阅后引用经典文献; (3)在讨论到风险的领域特异性(domain-specificity)时应该引用一些该领域的针对性文献, 如 Weber, Blais, & Betz, 2002; Wang, Kruger, & Wilke, 2007; Wang, Zheng, Xuan, Chen, & Li, 2016)。

回应: 尊敬的学报编委, 首先感谢您对两轮修改过后的文章的认可, 其次, 根据您的最新意见我们做了如下具体修改。

1、感谢您的建设性意见! 我们认真阅读了过去两轮与评审人的对话, 现已将回复函中有用的, 但未及时补充到正文中的一些文献进行了讨论与引用, 包括您提及的文献(Belk, 1988; 2013; Burke et al., 2010)。

2、感谢评审人的建设性意见! 我们查阅了该领域的文献后, 首先是补充了关于风险定义的经典文献(Bernoulli, 1738; Friedman, & Savage, 1948; Mishra, 2014; Wang & Johnson; 2012), 其次是在论述风险敏感性理论时增加了新的文献(Caraco, Martindale, & Whittam, 1980; Mishra, 2014; Mishra, Barclay, & Sparks, 2017)。

3、感谢您提供的关于风险领域特异性的文献, 我们认真阅读过后, 受益匪浅! 目前已经替换了相应的文献, 并已经放入参考文献中。

上述涉及到的修改内容都已经在正文中予以红色字体标注, 并已在参考文献部分做好相应的修订工作。

再次感谢您的辛苦付出!